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山西作家协会主席

著名作家 张 平

激情推荐

吕日周在朔州

王宝国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雁过留声，人走留名——晋北民谚

吕日周在朔州

王宝国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吕日周在朔州/王宝国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7.2

ISBN 978-7-5059-5503-5

I. 吕… II. 王…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1812 号

书 名	吕日周在朔州
作 者	王宝国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郭 锋
责任校对	小 平
责任印制	李寒江 郭 锋
印 刷	北京市通县蓝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
插 页	3 页
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5503-5
定 价	24.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王宝国

笔名宗白。1958年重阳节生，山西省朔州市人。

无党无派，非宗非教；
民主思想，民间事业。

主要工作经历：读书、
务农、干部、自由职业。

198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83年以来从事新闻工作，1996年开设了林森文化工作室。

已发表的文学、新闻作品有600余篇（首）。出版著作有《今古轶谭》系列第一集《平鲁人的故事》、诗集《风中树》（合作）、《魂兮不朽——民族女英雄李林传略》。

责任编辑：郭 锋
封面设计：杨 扬



在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现场工作会议上（赵继尧 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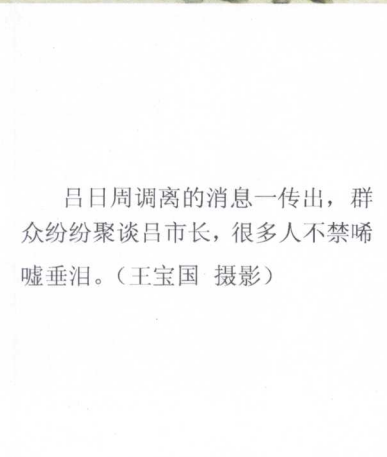
《中国民兵》1989年7月号
的封面：吕日周为入伍新兵戴花。
（《中国民兵》编辑部 供图）



帮助朔城区鞋厂下乡卖鞋（张继仲 供图）



雪后调离路，吕日周绕道应县，留影于著名的应县释迦塔。（常晋怀 摄影）



吕日周调离的消息一传出，群众纷纷聚谈吕市长，很多人不禁唏嘘垂泪。（王宝国 摄影）



作者于2005年春在农村采访。（冯国山 摄影）



世人争阅“来得太迟”的“长治”“龙年”，不能不访“走得太早”的朔州市长；

欣见滹沱河边“搭台”唱神州，却又雁门关外“两河夹一州”。

正赏举世闻名的太行“落实”，又叹鲜为人知的雁门悬念……

回应邓小平，他要建内陆香港；约定阿曼德，他要塑博士铜像。

美洲客人说他“新共产党上山”，土著人士说他古纪县长再世。

本书记述的是改革家吕日周先生从山西综合改革试点县原平到新建市朔州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幽默处处捧腹，情节感动时时沾巾。

问故事专访黎庶，求真实不避斧钺。作者遵循民间原则，作品叩问历史规律。民间的传奇，民间的真实，民间的吕日周，民间的本作者。

植根在历史的大花园里

序《吕日周在朔州》

王宝国

王宝国《吕日周在朔州》一书，即将出版。书稿转来，我停下手中的工作，仔细阅读了一遍。

本书记述了吕日周在原平县委书记、朔州市长任上时的故事，从中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吕日周亲民、勤政和思想超前、矢志改革等特点。

书稿把我带入深深的回忆和久久的思索中，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我是在1980年我国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刻做了新华社记者的。这时，我带着解放思想、推进改革的思考走下基层，在山西各地，时常听到一位刚刚前来调研过的省委政策研究室干部：吕日周。经深入了解，我发现年轻干部吕日周勤于调研、勤于思考，具有超前思维、大胆改革的意识，是那个历史时期难得的思想资源的体现，我怀着对新型干部的热爱，对他进行了适时的报道。正是这次报道，使我加深了对历史的思考与把握。

转眼到了1983年底，根据中共中央胡耀邦总书记的指示，



吕日周在朔州

我和总社记者邹爱国受命采写山西省一位年轻干部，因之而会见了省委书记李立功。李立功书记还热情地给我们介绍了另一位年轻有为的好干部，要求我们给予宣传，他就是已就任原平县委书记的吕日周。

此后，吕日周在原平县进行综合改革，创造了引起中央领导与众多学者肯定与高度重视并轰动全国的“搭台唱戏”富民经验，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对于吕日周的成就，新华社总社在研究报道计划时曾指示我们给予报道倾斜，先后派《瞭望》杂志记者何砚平作了深入报道，摄影记者周树铭进行跟踪采访；《光明日报》记者林玉树等主要媒体记者都采访报道过吕日周。在此期间，我也作过报道，在新华社发了通稿。

六年后的1989年，吕日周调往朔州，任市政府筹备组组长，数月后当选市长。原平县是当时全省综合改革试点县，在中央和省委的直接支持下，吕日周得以发挥才干，取得卓著成就。来到朔州后，他又提出了朔州市要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服务模式，得到省委肯定，之后他又参与了一个试点市的领导工作。在朔州，建制新生，他积极谋求与美国友人合作进行城市建设，并筹划申报单列市；农村改革，他提出并部署了“发动千家万户，创办千园万场（厂），组织千万干部，治理千沟万壑”农村经济战略；教育改善，他发动捐款、集资近588万元兴建和改善了农村教育的基础设施……吕日周在朔州工作仅14个月就被调离，成为他个人和朔州乃至山西政治史上的一个特例，被称为“雁门悬念”。

除了他的施政大略正在施展或即将施展外，吕日周在朔州留下了亲民、勤政、改革的足迹与思考，产生了和老百姓在一起的大量故事。

我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方式，走过了中国改革开放的20多

年历程。20多年中，我接触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共领导人和国家领导人、各级各地领导和各界人士。在改革开放大潮里如星河般的人物中，吕日周以其独特、鲜明的色彩，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尤其是在我回到故乡朔州的时期，耳听有关吕日周的故事和言论，实属经常。从故乡人民对吕日周的谈论中，我听出了民众的意愿，听出了社会文化的倾向，也听出了历史的主旋律。因此，我时常被触发一个想法：采写一部吕日周言行录。我想，做这件事至少有三个意义：一是弘扬正气，树立楷模，以为人们增强前进的信念；二是伸张民意，探索文化，从而探寻并把握政权与民众之间的真实纽带；三是记录历史，立此存照，以供今人与后人研究。

就是在我这样思考着并计划着的时候，王宝国送来了这部书稿。

王宝国奔走各地，访官问民，历时三年，厥成其著。全书分序部、正部两部分，分别记述了吕日周在原平和朔州的故事与政略。王宝国的情形很是独特，他不在国家干部行列，不领任何单位的工资福利与补助，却长年以个人形式坚持民间采风写作。他的采写立意是围绕民心、侧重社会、强调历史，其方式与风格兼有记者和作家的特色；他出版的作品都带有强烈的民间的、古典的气息，有一股无法取代的韵味、鲜味、风味，使人读之欲罢不能。由王宝国担当了吕日周故事的采写，也正是历史的似乎有意的一个安排，这个“安排”很合“天意”（“天意”就是“民意”——吕日周语）。

由于作者的历史观念和民间意识，他这本书恰好体现了我的上述几方面思考。

从本书的选题与风格，我再次发现一个道理：分析、审视任何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都要站在历史的角度上，站在国



吕日周在朔州

家、民族的立场上。只有这样，才能摆脱种种狭隘的世俗的观念的限制，得出正确的结论，获取有益的反思。因此，我认为吕日周在朔州时间上虽然仅只一年多，但他留下了亲民导向、超前思维、改革思想等精神财富。他的这一段悬念式的朔州历史，和他那段如浪潮般的原平历史一样，也是一个历史存在。两个紧相连接的历史存在，为作者所看到，并特意紧相连接地呈现在一本书中，这个意味不能忽略。

从某种意义上讲，吕日周的这段朔州历史别有一番意境。从历史的高度俯视一切，任何官场荣辱、个人得失都将是过眼烟云。只有那些真正为了人民幸福，为了民族进步，为了国家富强而努力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细节，才是真正植根于历史大花园里的花木。

合上这部书稿，我联想到一位哲人的话和一位退下来的中央领导的话。哲人说：

“政治人物一定要活在大众心里，更要活在历史上！”

那位退下来的中央领导前不久对吕日周说：

“你是一滴水，从你身上映照出中国的一个时代。”

读这本书，就是横观时代，纵探历史。

2005年12月22日于朔州七里河畔

“意天”合册“甜笑”个叙，甜笑个一（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

民间的阳光

《吕日周在朔州》自序

2003年的早春，广袤的土地躺在一冬一春充足的雨水中，被冷风吹醒。城市的街道里巷，乡村的阡陌山湾，人们都已开始了充满希冀的行走。

冬雪春冰，满路泥泞。三月末的这天，我走进朔州市蒋家坪村后少家堡村前的湾里与人拉呱。

我和别的走在泥里的人们既相同又不同，和别的走在水泥街道上的人们既相同又不同。我起身再行，忽然为自己的身份所迷惘。这时，一段对话响在我身后的湾里：

“他是干部吗？”

“不是。”

“他是记者吗？”

“不是。”

“他是做啥的？”

“他就是王宝国。”

我的大脑划过一道闪电。我没有桂冠，也没有印记。我就凭着走在泥里的人们一见能呼“王宝国”三字，我左右逢源。“王宝国”三个字就是我的桂冠！

前些年，我在自己的生存领空做了一场果敢的大拆建，抛却世功攀援之纠缠，成为内地社会少有的交民间友、记民间事、作民间



文的文化职业者。我一不开国家工资，二不领采访补助，三不受御制题目之限——我是体制外的“自由人”。我和老百姓互无功利之需，他们从来不哄我（他们讲的故事虽然有时不准，但却大多真实）。多年来，我就是仰仗了这样的“桂冠”，这样的自由，而获得丰富的真实，成就着我的一个个专题。我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来观察、描摹这个社会缓慢的变革过程；我观察着、描摹着，然后就有众多为人们惊喜而又熟悉的人物涌来笔端。

每当这时，历史老人如电的目光就强烈地照射在我的头顶，我知道我没有权利回避或忽略掉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物。我也不能用众人所熟悉的那些文字面孔来评价他们。所以，在我的笔下，这些为人们熟悉且惊喜的人物盖非官方或者干部怎样讲，而是百姓如何说；不是当前如何权势煊赫，而是历史将怎样裁判。

忻州市一位农村老支书对我说：“你须明白，世上没有救世主！”我从老支书脸上沟壑纵横的皱纹里读出了此言的震撼力，我久久无语，感觉到残存在心灵中的种种迷信像秋风下的枯叶般纷纷脱落。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所谓“争议”之类，在我心中开出的花朵非常本色。

进了少家堡村前的河湾，我的双脚陷在泥中，抽出双脚，却又把袜子陷进去。这条辽远而泥泞的路，是朔州市首任市长吕日周走过的。如今，我正在循着民间的传颂，沿着吕日周当年的足迹再走一回。

提了泥污的鞋子，坐在这朔州市当年最北端的土堰上，旷远的山中奇异的静谧，将我推入与所有文人既相同又不同，与历年的早春既相同又不同的劳累而又畅快的和融中。

（一）

2003年2月末，我和我的弟弟王树国在朔州火车站候车，他告诉我他读了一本新书：《长治，长治》。他讲述大家如何争阅如何

激动，我接口道，作者吕日周是我们朔州的首任市长！

1989年元月，由于在朔县、平鲁县区域内先后建成了一家大电厂、一家世界级中美合资大型露天煤矿，国务院批准，划雁北地区的朔县、平鲁县、山阴县，设立朔州市。服务新型企业，设立新型建制，配备新型干部——沿着一个正确逻辑，在山西省综合改革试点县原平县，以成功的改革实践而轰动全国的著名“社会主义改革书记”吕日周，担任了朔州的市政府筹备组组长、首任市长。

但是，逻辑有时就会紊乱，高票当选朔州首任市长的吕日周，在投身紧张的建市工作仅14个月（他正式当选市长才仅8个月）之际，就被突然免职调离。于是，一个关于吕日周，关于朔州、关于山西，关于政治、关于文化的“雁门悬念”形成了。

火车到站，我托王树国代买《长治，长治》50本。

我好奇地把这50本书送给城里村里我的那些“土”朋友们。

意料中的和出乎意料的反应，都展现开来，我面对如此情境，意识到我已经身在一个义务中。连续的有意识的采访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乐趣伴随着艰苦的活动，造就着我的一段独特经历。我颤抖地看到，百姓的心，就像开在满山坡的花，碎小而又广大，纯净而又茫然。他们见一股小风吹来就当作希望之神降临，我竭力用笑容覆盖眼泪。

谁也不是救世主。谁也不能宣称什么。我和我笔下的每个主人公如果能做到问心无愧，我以为我和他们就接近神了。我清楚地知道，我虽然动笔了，但我不敢当调墨兑彩的画像家，我只做了调光对焦的照相师：百姓和官员们是如何讲述故事的，是如何表达他们的倾向的，我就如何去转述，“非所谓作也”。

我多么希望能够还原曾经发生的那些鲜活的感人的细节，用真实细节来告诉读者一个更生动更清晰的吕日周。但是，岁月的风烟既没有为我网开一面，我又不敢对读者擅作想像代理。所以，望读者能够用你的阅读经验来补偿我的采写不足。作者先此致歉，并致谢。



吕日周在朔州

（二）

无论有多么大的艺术不足，都不影响我完成这本书的写作。这个选题对我来说合适得有些丝丝入扣。这是因为我独特的文化视角、文化企求，以及独特的人生寻找。

一本残缺的杨家将故事，培养了生于农村的我在少年时代的阅读能力，带给我既要浴血又必蒙冤的文化启蒙。阅读王安石变法带给他个人的悲凉命运，使我这个远代知音又积结了难以释怀的失落感：民族精英必然为民族命运而担当而牺牲！我坚定地认为：即使孔子研道、文王创易、秦皇统一、贞观极盛……任何政治文明、科学文明都应以变法（改革）文明为核心。到近代，孙中山先生摧封建之崇阿而浚民主之先河，却如万顷海潮中的一叶扁舟，辛苦颠簸于前前后后的新老复辟浪涛中。是鲁迅先生的呐喊声长响于民主文化的天空，使我明白，民族的精神需要的是唤醒，而文化人——真正的文化人的使命必然是承担这一千次一万次的呐喊的责任。

这就是我的长期以来的企求与寻找：改革与牺牲，一个英雄的正反两面；民主与文化，两个兄弟的内在同一。这样，文化责任心的灯火，才不会熄灭于个人生存中荣辱得失之波澜。

后来，我读到了做山西省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的吕日周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其中一语赫然触目：“汽车前进的代价是汽油、柴油，而历史前进的代价是血水、泪水和汗水。虽然改革的序幕已拉开，但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这，引发了我的历史性思考，我终于接受了一个无情的事实：在制度的天空得以理想化改造之前，我们中就必须有人来担当。担当蒙冤难免而仍须浴血的忠诚，担当明知艰险而仍无畏变法的牺牲，担当虽咯血而仍呼号不止的责任。

我还必须沉重地说明一个情况：我的采访并非满是激动。老百姓对我的倾诉，我只能当作消话，述说在此，请读者代作价值判别的选择——

2003年春，晋北有位农民困惑地向我发问：

“你既是采访吕日周的故事，你一定水平高，你给我们解释一个问题：‘三个代表’代表不代表我们一家一户小农民？”

该农民的问题连着故事：他向公安局长反映该局治安大队在他受欺压后反而欺良压善，残暴殴打他全家的恶行，局长说“我管的是全县大事”，顾不了你这小事！遂将农民逐出门外。农民又向县分管领导反映，问：“‘三个代表’头一个代表就是代表人民哩，公安局长为什么不管我的事？”县分管领导念着“三个代表”的原文，解释道：

“‘三个代表’头一条代表的是‘最广大’的人民，你说说你一家一户有多‘广大’？”农民被问得理屈词穷，县分管领导随之也以“忙着全县大事”的理由，将他赶出门外。但是，该农民越想越不通：我不算“最广大”，那我算是哪部分？我不是“最广大”，那“最广大”在哪里？

2004年春，我无处躲藏地又撞到这种带故事的问题——

某县在20年前下文件招聘一批人员，从未办任何解聘、增招手续，其在册人员却在后来的某个时候悄然改变，有的没了，有的有了。问题反映到分管的副县长那里，副县长马上引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中央精神，答复说：

“我不给你这些个人小问题当这秘书！”

“三个代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论就像伟大的城堡，住在城堡里的不少人却在城堡下挖通暗道，运用暗道娴熟逃逸，“从心所欲，不逾矩”。